

范玉刚 著



道非

关于文化价值的祈想

人民日报出版社

范玉刚
著

通可道非

文化价值的新相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可道非：关于文化价值的祈想/范玉刚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115-0349-7

I. ①道… II. ①范… III. ①文化产业—研究—中国 IV. ①G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6248号

书 名：道可道非——关于文化价值的祈想

作 者：范玉刚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林 薇

封面设计：北京佰氏瑞驰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2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320千字

印 张：18.5

印 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349-7

定 价：38.0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序 论文化发展的“道说”
009 导论 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文化意识的自觉

上篇 文化观念与文化视野

- 024 第一章 从“文化冲突”到“文明自省”
026 一、他说了什么，是如何说的
030 二、其战略意图何在
035 三、可能的启示
045 第二章 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文化发展格局的改写
045 一、文化观念的变迁
058 二、文化发展格局的改写
062 三、切合文化发展逻辑的领导权转移
067 四、文化领导权沦丧的启示
072 第三章 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多重功能
073 一、对大众文化时代命名的哲学阐释
083 二、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多重影响
090 三、规范与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路径
102 第四章 提出“文化立国”战略适宜吗？
103 一、如何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106 二、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正当其时
114 第五章 文化遗产的保护
115 一、节日的仪式化与意义的本土化
119 二、文化遗产保护乱象分析

序

论文化发展的“道说”

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概念，更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席凡宁根研讨会报告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守护家园的“虚灵的真实”的价值保藏和显现，在它的显隐层面都张扬着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及其身份认证。文化发展必须关注文化内外向度的和谐及其文化秩序的重建，当前尤其要关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文化的价值批判和人文向度，使之不偏离以人为本的航道，高度警惕文化产业自身滋生的价值失衡及对人文价值遮蔽的偏颇，和与外来“入侵”的文化霸权“合谋”扼杀民族文化的不自觉性。文化的有序健康发展，对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外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和渠道。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其创造历史时形成的特有的一套说法和活法。世界上一切配称伟大的民族，一定是那创造了辉煌文化的民族；而历史上一切彪炳青史的历史英雄，一定是在文化创造中有过非凡贡献的人物。伯纳德·奥斯特利在《文化联系》一书中指出，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简言之，文化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从发展的角度讲，文化是道与器的结合，是内向度与外向度的统一。因而，所谓发展就不能单纯指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还要有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的发展，甚至有的国家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以文化为轴心而展开。在文化时代，文化从社会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配角变为主角；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谈到文化的发展，文化

中的某些部分在时间的长河里只发生变化而无所谓发展，譬如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很难有孰高孰低之分；文化中的有些部分不但经历变化而且历经发展，譬如不同时代的知识系统就可以区分出先进和落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在显现形态上可以展示为不同的文化力，就力量而言可以有强弱之别。因此，鉴于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笔者建议在国家层面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的主张，以期在新的文明跃升中，中华文明能够成为领跑者，中国文化能够在文化时代的来临中担负重要使命。

本书之论“道”，诚然瞩目于文化的虚灵的人文价值，它有其现实的经验形态，显现为社会的主流核心价值；但又不为现实所囿，而有其理想的超越维度，有其可祈向的某种仰之弥高、趣之弥远的极致状态。惟此，对其无尽的追慕中才有“守”与“拓”之分别。也就是说，既要着眼于它的恒定性，又关注其时代的流变性，这实际上契合的正是当下文化发展的两个向度之间的和谐。说到底，文化之事业与产业之分，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解放，是对文化返回自身与应当的领悟。它既要在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大众文化需求、建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守道”、“弘道”，也要在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中“守道”、“弘道”；同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大发展也是一种“拓道”。由“守”至“拓”乃是意味着对“道”的悉心领悟中的一种主动，一种积极有为，这毋宁是在为伟大民族复兴植根和呐喊。正是对文化发展两个向度的自觉，才会避免出现“道”之萎缩，表现为多元文化中的孤立无援；或弃“道”求技，表现为文化产业发展中对市场效益的任性追逐。当下，文化价值既需要弘道者“守”，也需要切合时代语境进一步提升、扩充，也就是说，在全球文化博弈的世界舞台上，要勇于张扬主流文化价值观，高扬有别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使之有效地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中，在全球化舞台上共舞。这毋宁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守道”和“拓道”的统一。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本书论“道”并不是为意识形态辩护，而是着眼于文化自身特别是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的发展及其观念的变迁，贯注到文化产业的崛起对文化价值的冲击和机遇。其实，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发展既有一种瞩望，也有一种忧虞。

本书所谓问“道”，主要是通过具体现象分析阐释来关注社会核心价值的贞立与践行，探讨文化无论如何发展，其核心价值都是根本。从西方各国的核心价值来看，实际上都植根于自身的主流文化，扎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就是“守道”；同时，要想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就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在开放中有所创新开拓，此即谓“拓道”。无论“守道”还是“拓道”，其根本诉求都在于文化认同。“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希望。”十七大的高度论述，表明了党的文化自觉。本书虽然关注一些文化现象，但其用意和用心都落在“守道”与“拓道”上。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向外输出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所谓的美国精神和美国信念，其定位与诉求是清晰和明确的。中国的声音稚弱在于“走出去”的文化产品缺乏诠释自身文化价值的理念、思想和话语，其价值诉求是混乱和模糊的，难以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难以展示出明晰真实的中国形象。“我们是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是什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等等，对外文化输出说不清楚，对内普通老百姓也不清晰。要想把中国核心价值说得清楚，说得明白，首先要自己清楚和明白。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要讲清中国文化之“道”，要在与世界文化沟通对话中弘扬中国文化之“道”，在自我阐释和向“他者”的自我说明中，逐步走出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危机，使中国融入世界成为全球性共识。

“中国崛起”已经对世界进程和发展格局产生影响，其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遭遇金融危机，随着G20国际协商机制的建立，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虽然刺痛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神经，但它也不能不感受到这事实的坚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一些大国的遏制意图愈加明显，甚至在各个领域频繁制造“事端”，频频“军演”和穿梭外交，对中国的怀疑和戒惧愈加深重。也就是说，“中国崛起”事实上在改变着世界战略格局的重组，但它的文化意义并未得到世界的认可与理解，世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清晰的“中国形象”，也难以领会中国的价值诉求，在文化发展格局和信息舆论方面，仍然是西强我弱，

我们处于弱势、守势，这要求我们必须极力宣扬和拓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如果没有“文化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意义就是不完整的，中国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世界大国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硬实力上，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上。一个处于文化高位态和占据世界文化市场高端的有着持久影响力、辐射力和消费魅力的文化，不仅使世界产生亲和力、认同感，还会在自身文化的丰富中完善大国的“神话”，不断制造出合理性的话语，从而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掌握文化领导权。以此鉴照当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走？在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更要重视和加强国内的文化建设，直面国内的文化乱象和文化发展困境。

关注文化发展必须要有一种前瞻意识和战略意识，更要有一种文化思维和文化自觉。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文明》中指出：以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彻底改观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现代文明，从而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也就是说，一个尚未成形、渐趋成形的新时代即将来临。在谢弗看来，如果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变成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体系将根据文化的最高、最明智和最持久的原则而不是最基础和最简陋的实践来被设计，那么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将成为必需。这个力量就是文化发展，文化发展毫无疑问就是一股引起重视的力量，[1]和经济、政治、技术和宗教一样，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其影响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类发展陷入的困境越来越需要文化力量的引导，对文化的思考展示出指向未来的可能。当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主张“经济生活、力量、技术的现实和一切有助于人们物质福利的现实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精神、智慧、道德和美学价值以达到平衡”时，[2]实际上是暗示“文化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方面就是它着重于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着重于文化的完整性、创造性、统一性、多样性、关注性、分享性以及合作性，试图推动人类进入下一个历史上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把文化视作引导未来的灯塔。以此来看待文

[1] 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第240页。

[2] 卡尔·温特劳布：《文化观点：伏尔泰、基佐、布尔克哈特、兰普莱切特、赫伊津哈、奥尔特加-加赛特》，第216页。

化，就可以把世界的发展看成“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文化力量的充分展示，就可以为未来创建一个更加有效的世界体系。

作为一种远景的昭示落在现实中就是：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到底不起作用？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不同的学者和政要对此都给予密切的关注。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1]亨廷顿与哈里森也极力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虽然学者对文化作用的理解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大家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文化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趋向美好，越来越趋向民主和自由。文化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创建并传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供所有的公民使用。作为在特定文化和文明的兴衰中一颗清晰可见的耀眼明星，文化成就这一宝库是人类历代进步的真正量度。它不仅是所有人民和国家的结晶，而且也是所有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论他们的教育状态、社会经济状态或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如何。”[3]文化作为一种普及的力量提升人类的生活状态，此外，文化具有把整体的各个部分结合成更紧凑、更令人信服、更和谐的整体表现的潜力，这些力量和其他力量相融合就创造出更加完整的和人道的人类环境。就历史意义来说，文化的力量很容易加以确认，特别是妥善的预防和安全措施来确保文化朝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结果发展。从究极意义来看，文化是新世界的曙光，为所有的人民带来希望、尊严、平等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就是人类的发展。这从谢弗描绘的一幅文化时代的远景中可见一斑：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要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4]文化时代呼唤一种

[1]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

[2] 参阅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 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第12页。

[4] 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第9页。

新的均衡的发展观和一种以生活为中心的文化思维方式，究其底蕴，这个时代的内核就是对文化价值的守护和拓展。

文化昭示的愿景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去为之奋斗。正是在此愿景感召下，我们格外去关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同时提供了思想解放的软环境。可以说这是一场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文化体制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宗旨是解放文化生产力，也就是解放和发展精神文化的生产力。在当下时代，不仅人类的全部物质经济生产和生活都渗透着精神文化生产的成果，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崛起，精神文化生产日益走上社会生活的前台，精神生产本身也成为强大的经济生产领域，甚至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思想文化和经济生活两个方面日趋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文化生产力固然要附着于一定的物质形式，但主要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虽然强调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但在根本上更是要凸显文化的创新力和原创性，也就是说通过焕发文化的创造性推动精神价值的生产。文化发展要考虑到：“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等为代表的精神生产系统，与以大众传播和群众文化生活为代表的精神流通——消费系统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关系。”[1]在相互交流互动中使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构张力保持平衡，有效破解思想观念中的“路径依赖”，真正在源头解放文化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繁荣。因此，精神生产领域的创意创新，才能推动文化生产的大发展。

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强弱，成为衡量国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文化产业是新时代语境下文化和经济交叉相融合的一个产业门类，作为一种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价值的全新经济增长方式，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新形态和“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伴随着经济转型和文化崛起，文化与经济加快相互渗透，文化

[1] 李德顺：《深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理论视野》2009年第12期。

产业与经济加紧融合，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趋势更加凸显。一方面，经济发展由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从制造向营销和品牌两端转移，经济产业需要借助文化力量增强文化含量和科技水平，通过文化为其注入灵魂和增值。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借助经济产业要素、产业平台和流通手段，借鉴经济产业模式、依托经济产业优势、利用经济产业营销方式，实现自身跨越发展，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积极顺应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发展趋势，推进文化产业与经济的融合，让经济利用文化力量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让文化借助经济力量做大做强。美国、英国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早就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提速期，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云南、山东等省市不仅提出建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还试图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坚持高起点整合文化资源，借助高新技术优势跨越式发展，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化、产业化、社会化与组织化程度。当前在文化结构上，文化产业结构、文化产品结构、文化技术结构、文化进出口结构都还不合理，与国际先进国家比较，我国的文化产业散、小、滥的问题依然存在，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不足，竞争力不足。必须确立文化产业的品牌意识，培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文化市场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民营资本在文化市场的作用，积极扶持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鼓励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允许外资进入的文化领域。利用我国现有经济规模和科技优势特别是信息产业优势，生产蕴含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和理念的产品，通过市场化运作解决主流文化、高雅文化萎缩的状况，如《云水谣》、《云南映象》和“丽江模式”的成功运作，还有当下如火如荼的“红色旅游”开发。在文化市场分类上，既培育不同等级、类型的市场，又关注当下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互融合趋势下各个不同分类市场的相互贯通。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在政府与文化企业之间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仅使其规范行业自律、制定标准，促其良性竞争，还依托它们把文化资源优势通过中介整合到产业经济链条中，经由产业链条使资

源转化为生产力。除培育经得起市场风浪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还要有针对性地设立文化产业集聚区，就像当年成功地建立高技术孵化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把这一发展理念纳入到文化产业战略中。如加拿大的魁北克文化产业基地已成为加拿大文化产品生产与经销中心之一，韩国为鼓励文化产业发展而特设“游戏园区”等。文化产业园区不仅要有龙头企业，更要孵化大量有创意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作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重要环节，不但对于文化产品的丰富起积极作用，还承担产品的创新功能。就发展文化产业现实而言，与其提倡表面上做大做强，不如推动做“特”（特色）做“精”（品牌）做“高”（高附加值）做“长”（延伸产业链条）。打破制约文化产业发展障碍和壁垒，切合各地实际培育带动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链条的优势产业。以内容和展现方式的创新，来优化和发掘文化资源，以具有意义含量的文化创造活动为中心，层层扩散形成一个由内容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的生产链。经由产业化增强文化的社会凝聚力、整合力，在社会文化变迁及重构过程中，使社会底层及少数民族文化也相应获得发展空间——拥有一定市场份额。

对文化价值的守护与开拓旨在切合时代语境变化来提升文化竞争力，因此，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可以说是合乎历史机缘的“拓道”，因而，文化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文化发展能优化产业结构的理念自然就成为“道说”的必然内涵。



导论

文化表达的自由与文化意识的自觉

文化发展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消费性文化的发展，一是生产性文化的发展，其中关乎国家和民族文化原创力的生产性文化是核心，它处于文化体系的枢纽地位。生产性文化的发达才能形成文化的真正繁荣，其前提就是文化表达的自由和文化意识的自觉。

在全球对后现代景观和地方性的关注中，我们执著于对宏大话语的构建和恢宏场景的展示，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性诉求中国国家意识的偏颇及其美学表达上的焦虑！作为执政党，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风云际会的全球互动对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化发展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消费性文化的发展，一是生产性文化的发展，其中关乎国家和民族文化原创力的生产性文化是核心，它处于文化体系的枢纽地位。生产性文化的发达才能形成文化的真正繁荣，其前提就是文化表达的自由和文化意识的自觉。从更深层次来讲，它是化解时代文化难题的真正动力源！推动文化发展必须有效化解导致三个“不同步”现象的深层困境，特别是背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的落后，所谓三个不同步现象是指：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文化发展与中央政策要求的不同步，文化的格局与社会公众期待之间的不同步，三个不同步现象构成了文化发展的时代难题。破解难题必须找准症结点和有效路径，那就是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大文化观，培育民族文化根基，明确文化发展必须以文化观念的解放、文化意识的自觉和文化的方式来推动，通过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发展铸魂，为民族复兴重构精神家园。惟此，通过革除文化体制的弊端和发展的障碍，逐步化解“三个不同步”现象的负面效应，才能使国家的四位一体建设趋于同步和谐，最终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形成具有鲜明价值观的高位态的主流文化。

文化表达的自由是实现有效引导的前提

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7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胡总书记的论断触及了当前深化改革的症结点，即要抓住文化生产的源头，这是文化繁荣的基础，而一切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文化繁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文化表达的自由是解决当前文化体系中消费性文化与生产性文化结构失衡的关键。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公众文化消费选择的自由越来越大，消费性文化风起云涌，在不断满足大众愉悦身心的需求时，“三俗”文化也借势膨胀；同时，因生产性文化运作机制的僵化和体制不畅并未从根本上革除，致使文化市场的“战略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好作品、大作品依然乏善可陈，

呼唤时代精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成为大众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弊端不但制约当前市场“灵验”功能的发挥，也深刻影响主流文化对多元文化的有效引导。破解问题的思路越来越指向文化体制的枢纽点，文化领域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越来越聚焦于上游的文化生产，文化表达的自由成为驱动改革的关键。文化体制在发展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它在信息社会承担着信息守门人和开门人的重要职责。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既要着眼于如何推动文化市场的繁荣，更要关注如何在源头上解放文化生产力，也就是说给文化生产以表达的自由。这既需要意识形态的松绑，也需要文化制度创新的有效衔接。只有在体制上理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依靠输入消费文化来满足需求，才能真正解决文化体系中生产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的失衡问题，才能为文化创新、文化创意、文化创造提供可能，才能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从根本而不是末端来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表达的自由是文化生产力解放的表征，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保障和前提。文化表达的自由既是社会开放和进步的吁求，也是社会环境宽松与思想解放的先声。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设计者、思考者，既要关心体制上的松绑；更要关心以什么样的文化意识指导文化生产，并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规定。说到底，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在技术性和操作性层面扶持几个大项目，搞几个文化园区，成立一些大型文化集团，甚至建几个豪华却冷漠地把底层民众拒之门外的文化地标，而是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内容产品，使文化真正焕发出活力，自发形成文化繁荣的盛景。只有一个宽松自由表达的舆论空间，才能催生人的创意和创造性，复调的音乐是动听的，就在于它由不同的声部组成，多样性的文化才能形成一种文化的高地。文化繁荣的标志是在四位一体的建设大格局中建构一种有广泛影响力的高位态的主流文化，建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精神、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华文化。

文化表达的自由要能切近时代的历史语境。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享有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政治参与资格。现代社会普遍推行有限政府原则和法制原则，并严格限制公共权力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必须有底线，那就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在密尔看来，不仅个人所

拥有的思想及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个人联合的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就是有些不涉及侵犯自由的问题，政府也不应干预。何谓有尊严地活着？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能够自由地获取世界的信息，靠着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做出判断，就是幸福和有尊严。文化表达的自由要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既要对社会变革、转型有深刻理解，也要对即将进入的这个尚未成形、难以领会和说清楚的新时代——原先的世界以有形的力量和物质作为基础和支撑，而新世界是虚拟的无形的，以超越性的无形的文化力量为基础和导向，对此要有一种前瞻性和战略意识。文化新时代的来临，绝不单纯是新视角和视野的变化，而是带来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深刻变革。当下，言论表达的语境和效应已发生变化，无向度、失序的网络化效应成为言论自由表达的主导方式。文化发展要有能力去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非替代性关系，新媒体的生成决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甚至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重新定位。数字化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下带来的恐慌渐行渐远，新媒体的去性别化、去年龄化的趋势，特别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相互融通与信息共享给受众更多的自由选择权，这给大众带来的是自由、愉悦，甚至是某种解放，这种解放拓展出新的存在方式、消费方式，使受众在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消费方式上有一种自由感，这种消费的多样性和自由必然催生文化表达的自由，文化表达的自由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格局和时代境遇。

文化表达的自由还要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深刻影响，受新媒体新技术的驱动，文化的定义不断被拓展，文化表达被赋予新的使命，新媒体、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在重组未来的新格局。当下文化价值的传播越来越与现代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相交融，对互联网舆论的导向要有一种警觉。譬如，欧盟等越来越重视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推动对人权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增进表达和信息自由，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新技术所蕴含的文化潜力。文化表达的思想、价值受到普遍关注，特别是现实问题、民生问题成为文化关注的对象。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流行语的大量出现折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当下的流行语

已超越单纯的“恶搞”层面，而融入更多的民意诉求。始自2009年的“织围脖”潮流，就是微博使用者无意识的集体躁动，省去遣词造句和缜密构思逻辑的“繁文缛节”，140个字符用来随意表达最想沟通交流的话，手机发布的加入让信息传递更加及时，许多公众人物都参与其中。文化参与的均等化，给时下缺少享受愉悦和知识手段的那些人带来愉悦和知识的好处，参与文化活动会更有效地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既造福社会，也化解公民对主流话语的冷漠。这背后的意味值得期许：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普通民众也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加大了公众的话语权，这可以视作文化生产的解放，生产性文化的繁荣由此可以得到期许。在新的语境下，对言论表达特点和舆情导向要认真研究。对言论表达的引导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讲空泛的官话、套话，不进行空洞的说教；在方式、方法和策略上，要有一种文化自信，不能用压制、控制的封闭性思维，而是以开放、主动、全面、灵活的思维，顺时应势，与时俱进，积极直面言论表达的自由。相信言论自由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创造言论宽松环境的同时，主流文化要担当提供清晰明确的社会价值尺度和言论导向的功能与使命。

文化表达的自由要警惕文化市场的过分娱乐化，以及追逐低俗与庸俗的互相应和。为了吸引眼球和噱头的过度娱乐化只会带来道德水准与审美趣味的衰退，社会文化氛围的污染，价值观的混乱，“三俗”文化盛行的文化矮化状态。面对当下的文化失序、无序和空疏，只有找准问题的症结点才能找到有效的策略。相对于蔓延的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发起的游击战，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防御的阵地战策略往往无效，因为它根本找不准靶子，也难以分清“敌我”。现在的文化宣传部门面对挑战最有效的策略似乎是“娱乐化”的处理方式，表现为一切严肃“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娱乐化倾向，一些主旋律文化产品也披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外衣追求娱乐化（如电影《建国大业》起轰动效应的策略就是明星的集合，在档期某影院打出的广告语是“让我们一起坐在放映厅里数星星”），这表明文化应对的乏力和想象力的枯竭。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必然要打折扣，其可能的后果不仅使“三俗文化”愈加泛滥，更严重的是既耗尽了有限的防御资源，又侵蚀了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有效性，而臣服于大众文化消费的认